

「一轉眼20年，回歸歷程，歷歷在目。」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創始會長陳佐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感慨道。這位曾親歷香港回歸談判、回歸後又長期從事港澳事務的官員，向記者講述了香港回歸前和回歸後的幾個小故事。談及回歸前談判細節，他表示，郵票、徽章、徽號看起來都是很小的東西，但必須彰顯中國主權，不能不重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陳佐洱：回歸談判細微處 中國主權獲彰顯

回 | 歸 | 談 | 判 | 故 | 事

回歸紀念郵票印上「中國香港」

陳佐洱在接受專訪時特意帶來了中央政府1997年7月1日在香港發行的第一套紀念郵品，這套郵品中的6枚郵票上清晰地印着「中國香港」的字樣，而他最先分享的故事也與這套郵品有關。

英方曾堅持用原來字樣

陳佐洱回憶稱，為紀念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和中國香港特區的成立，中央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在香港發行一套紀念郵品。「這是在香港特區成立當天要做的一件大事，但在這之前特區政府還沒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代表特區未來的利益進行郵票設計、印刷和發行等所有準備工作，同時也需要英方的合作，所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1996年的7月到8月間就此開三次會議達成共識。」

雙方當時達成共識，中央政府代替香港特區政府發行的第一套紀念郵品由中方負責設計，英方負責印製和提前在香港發行發售。但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磋商過程中遇到一個嚴重的爭議點。陳佐洱說：「當時我提出郵票票面的中英文字樣應該採用『中國香港』，而不是港英時期的『香港HK』，我說一定要加上『中國』兩個字，但英方當時一度堅持要用原來的字樣。」他回憶稱，英方當時給出的理由是要尊重港人的習慣，選擇中性的表述等。

中方理據充足終達協議

對此，陳佐洱準備了充足的意見和理由，「我當時說，要採取『中國香港』的字樣主要基於兩點：第一，郵票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名片，縱觀世界各國郵票發展歷史，任何一枚郵票上面都明確地標註國名，以體現主權。雖然目前香港發行的郵票票面上沒有英國國名，但是每一張港英時期發行的郵票上都有英女王的頭像和王冠，這也體現英國的管治，可見港英時期的郵票也並不是中性的。所以香港回歸以後標明『中國香港』是天地義的。另外，我還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指出，將來香港特區可以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以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所以標出『中國香港』來，既能夠體現中國的國家主權，又體現『一國兩制』的國策特色。」

最終，在中英雙方就此事進行的第三輪談判時，英方接受中方意見，簽下協議。「郵票是國家的名片，必須要體現國家主權。」

■第一套香港回歸紀念郵品郵票票面上清晰地印着「中國香港」。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陳佐洱展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紀念郵品。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徽章徽號去掉殖民色彩

1997年7月1日0時，在香港舉行的政權交接盛典的會展中心各個慶典場所，以及在香港海關、邊界、街區執勤的紀律部隊人員都迅速卸下帶有殖民地色彩的舊徽號徽章，莊嚴喜悅地換上標註着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新徽號徽章。陳佐洱講述的第二個回歸談判故事，就與徽章徽號更新有關。

陳佐洱稱，徽號徽章雖然小，卻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當時磋商的一項重要內容，雙方對此展開的談判從1996年下半年開始，最終在當年年底達成共識，由英方負責設計一套關於香港七個紀律部隊的徽號徽號設計稿，中方負責把設計稿報回北京，並徵求有關方面的專家意見進行審議，審議重點即是否能夠莊重地體現主權。「最終各個紀律部隊新的徽號徽號最大的特點就是去掉原來標誌英國殖民統治的英女王王冠，代之為中國香港特區的區花紫荊花。」

陳佐洱說：「郵票、徽章徽號雖然很小，在當年彰顯主權的問題上，我們都那麼的重視。現在，一些『港獨』分子妄圖搞什麼『獨立建國』，我們怎麼可能允許？」



■香港回歸前(圖左)和回歸後的警徽。資料圖片

回 | 歸 | 後 | 故 | 事

中央助港不遺餘力 如父親關懷孩子

「回歸後，香港成功抵禦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等一系列衝擊，仍被認為是全球最自由開放、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和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這首先得益於香港社會各界700萬市民的共同努力，也與中央政府和內地省市區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香港回歸後，陳佐洱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轉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他向記者披露了兩件中央不遺餘力、「特事特辦」援助香港的故事。

港新機場貨運癱瘓 中央速施援手

1998年上半年香港新機場建設大功告成，7月2日一夜之間從啟德機場轉場到赤鱸角機場。「這在當時的確是個奇跡，但當時主管的政務司長有點好大喜功，沒有做足充分準備工作。一個星期後，機場的貨運站、電腦系統、機械設備都發生嚴重的故障，大量待出港的貨物滯留，進港飛機也無法停靠卸貨，位居世界第一的香港貨運陷入癱瘓，每天損失高達18億港幣。」

香港首次開口求助

7月13日下午，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向國務院港澳辦發函求助。「這也是香港特區政府第一次開口請求中央支援。」陳佐洱說：「香港希望中央允許有需要飛入或者飛出香港的貨運航班借用深圳黃田機場(現寶安機場)。這可是跨境借機場，涉及到民航、海關、邊防、交通、質檢等一系列複雜的問題。」

陳佐洱稱，港澳辦接到函件後隨即上報。第二天上午正好國務院舉行會議，馬上作出全力支持香港特區解困的重要決定。當天下午2點，即在港澳辦會議室召開國務院各有關部門會議，相關部門一把手親自到場，並表態為救香港機場，一切沒問題。不到4點鐘，已經形成一套相當完整的支援方案。

陳佐洱回憶稱，自己當天下午4時打電話給董建華，請特區政府次

日上午10時派代表團到深圳與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商談具體事項。打完電話後他與來開會的各部門負責人從港澳辦直奔首都機場。由於當天最後一個飛往深圳的航班已經飛走，一行人當機立斷改飛廣州，再從廣州機場乘車趕往深圳。「在廣深高速公路上，我接到中南海總機電話，錢其琛副總理辦公室給我來電話說，幫助香港解決困難的方案國務院已經批准，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務，要『特事特辦』。」

通宵訂出最終方案

當晚11點左右各個部門負責人在深圳迎賓館會議室通宵開會，到翌日凌晨5點，形成最終方案。待特區政府代表團10點到達深圳開會時，這份方案已經放置在他們面前的桌上。「方案決定，到達黃田機場運往香港的貨一律免檢簽關，40分鐘就能夠從機場到達皇崗口岸。香港來的貨也一律免檢，從落馬洲進入皇崗口岸到機場也是40分鐘；200個機場武警換上裝卸工人服裝，確保貨物萬無一失；各個貨運航班組人員能夠在香港降落一樣，從深圳到香港來去自由；飛機維修人員連同他們帶的零部件也一律能夠在深圳免檢；而且民航的收費要比國際標準低很多。」

陳佐洱指出，中央政府及時雨般的援助，大大提升外界對香港和香港新機場的信心。



■當年新機場運作初期貨運曾癱瘓，中央作出了「及時雨」援助。資料圖片

抗擊沙士 八天籌三卡車物資援港



■當年SARS疫情爆發期間，中央曾對香港提供口罩、防護衣及防護眼鏡等物資援助。資料圖片

困難，特區政府說缺醫少藥，提供一個單子給中央。中央和國務院當時的主要領導馬上作批示，要保質保量，一星期之內無償支持香港。」當時由國務院港澳辦牽頭，國家發改委、衛生部、藥監局等多部門參與此事。

「香港需要N95口罩，我們動用外匯去日本等好多地方購買。香港需要防護眼鏡，當時全世界只有德國一家工廠生產，一個月才能生產一萬個，香港要一萬個，實在很難滿足。我們與特區政府商量減到5,000個，也是用外匯全球採購。」

陳佐洱回憶當時的情況稱，香港還需要防護服，但內地與香港防護服樣式不同，需要樣品，最終通過港龍航班機組將樣品帶到北京。國家發改委馬上組織三家工廠日夜開工，在最後幾日保質保量完成。「特區政府提供單子後的第八天，在深圳皇崗口岸附近，中央將滿滿三卡車支援物資移交給特區政府。」

「中央像父親關愛孩子一樣，希望剛剛回家的孩子健康成長，有時候孩子耍點小脾氣也都容忍，但是你不能撒野，不能六親不認，若要自立門戶去當所謂的『國際人』，要『獨立建國』，那可不行的。」陳佐洱說到此處，連續用了好幾個「那肯定不行」。

陳佐洱講述的第二個回歸後的故事發生在SARS(沙士)疫情爆發期間。「2003年SARS疫情爆發，香港及內地廣東、北京等省市成為重災區。中央政府關心香港，問香港有什麼困難，特區政府說缺醫少藥，提供一個單子給中央。中央和國務院當時的主要領導馬上作批示，要保質保量，一星期之內無償支持香港。」當時由國務院港澳辦牽頭，國家發改委、衛生部、藥監局等多部門參與此事。

「香港需要N95口罩，我們動用外匯去日本等好多地方購買。香港需要防護眼鏡，當時全世界只有德國一家工廠生產，一個月才能生產一萬個，香港要一萬個，實在很難滿足。我們與特區政府商量減到5,000個，也是用外匯全球採購。」

陳佐洱回憶當時的情況稱，香港還需要防護服，但內地與香港防護服樣式不同，需要樣品，最終通過港龍航班機組將樣品帶到北京。國家發改委馬上組織三家工廠日夜開工，在最後幾日保質保量完成。「特區政府提供單子後的第八天，在深圳皇崗口岸附近，中央將滿滿三卡車支援物資移交給特區政府。」

「中央像父親關愛孩子一樣，希望剛剛回家的孩子健康成長，有時候孩子耍點小脾氣也都容忍，但是你不能撒野，不能六親不認，若要自立門戶去當所謂的『國際人』，要『獨立建國』，那可不行的。」陳佐洱說到此處，連續用了好幾個「那肯定不行」。

處理港事三十載

特寫



■陳佐洱接受專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感謝媒體還記得我這位已經退休的老人家。」這是陳佐洱見到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出的第一句話。

「我從事港澳工作已經三十年。」從1987年任中國新聞社港澳部主任至今，陳佐洱沒有停止過對香港的關注。1994年從國務院港澳辦派來香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負責香港政權交接事宜的談判。在這期間，陳佐洱等中方代表與英方就回歸事宜展開一輪又一輪艱難的談判，「五天五夜談成解放軍509名先頭部隊武裝人員提前進駐香港」等談判故事至今為人稱讚。1998年之後，陳佐洱在國務院港澳辦先後擔任副主任、常務副主任職務，主抓香港事務。2013年，他參與創立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為中國最權威的「一國兩制」研究智庫，為「一國兩

制」研究提供重要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

對香港未來三十年極具信心

「1997年7月1日，我作為中國中央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榮幸地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我還記得，6月30日下午起，香港下起瓢潑大雨，是我在香港工作四年都沒遇到的大雨。我入住香港會展中心旁邊的新世界海景酒店29層。居高臨下透過落地玻璃幕牆俯瞰維多利亞港，惟餘莽莽，雨水好像一盆一盆潑洩下來，整個玻璃窗好像貼上一層水簾子。」回憶起20年前的場景，陳佐洱依然動容：「我想，這也許就是蒼天在洗滌中國近代史第一個國恥的淚水吧，香港就是用這種方式走進今後永遠屬於她的祖國的歷史。」

談及香港未來三十年，陳佐洱肯定地說：「非常有信心。」三十年後正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會不會變？他引用《鄧小平文選》中的一句話作出回應：「香港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

「一國兩制」成功獲舉世公認

總結「一國兩制」在港實施20年，陳佐洱指出，「一國兩制」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香港回歸祖國的最佳辦法，也是回歸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最好的制度安排，是國家治理史無前例的創舉，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陳佐洱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5月27日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從國家的層面、香港的層面、國際的層面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他又援引張德江講話中一組數據稱，世界

銀行數據顯示香港在政治穩定、政府效能、規管品質、社會法治、貪腐控制、公民表達及問責等方面的指標都遠遠高於回歸前。「這些成功是整個中國、香港的成功，是屬於每一個香港市民的成功。」

陳佐洱認為，20年的回歸歷程很不容易，但也一步一走向勝利的過程，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新的勝利。「在『一國』的前提下，『兩制』長期並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能夠更有利於國家的主體社會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處於初級階段的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裡，都將這樣。」